

芭樂人類學

口述 / 李宜澤*、林浩立**、郭佩宜
整理 / 張時健

緣起

2006 年出版的《田野的技藝》收錄了本地青年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的田野工作故事，由中研院民族所的郭佩宜老師發起，並與中山大學社會系王宏仁老師合編給一般讀者的作品。《田野的技藝》所串連的這批青年學者，在人類學學門內持續推動相關討論，進而促成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於 2008 年推出學門通訊半年刊《人類學視界》。此刊物有意在制式論文期刊之外，開創一個供人類學家在學門內分享知識與思考的新園地。這股刻意溢出學術常規的寫作能量繼續向社會大眾擴散。有志的人類學家們在當時新興的部落格平台上再集結，於 2009 年創建了《芭樂人類學》。當年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原住民聚落，災後如何安置、遷村或重建，引發了社會對原民土地正義的激烈討論；《人類學視界》與《芭樂》都刊載了本地人類學家的思考與建言。尤其是《芭樂》，更開創了學術工作者合力參與公共辯論、以公共書寫介入社會議題的模式，成為知識份子快速回應社會時事的新途徑。從建制化的學術圈出發，《芭樂》的編輯與寫手們常以「野生」自況，呈現其實驗性與敢於冒險的精神。

《芭樂》的創建，也承襲了人類學者在社會政策與公共議題上進

* 李宜澤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iceplee@gms.ndhu.edu.tw

** 林浩立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hl.lin@mx.nthu.edu.tw

行批判與參與的傳統。當時，許多在歐美學成返臺的新生代人類學者，懷抱著介入社會的責任感。在《芭樂》成立後，他們依據自身在族群、性別、多元認同、地方意識等主題上累積的研究心得，輪職寫作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

另一方面，《芭樂》也為本地人類學學者提供了彈性而開放的交流空間。學界同儕除了在規格化的學術期刊和研討會中呈現研究成果外，亦能在《芭樂》分享日常思考與工作點滴。這些內容同時也為各自的教學帶來更多本地個案與素材，補足外文教科書在本地學生實作訓練上的不足。這個過程亦激發了人類學研究思路的轉向：那些原本習於遠赴異地、探究異文化的田野實作與知識，如何重新用於本地、在地紮根，或與本地社會展開更深的對話？

也就是說，一者本於人類學家的關懷回應社會議題或公眾討論，再者藉之分享自己研究的發現與思考。透過《芭樂》，人類學者得以與社會大眾及學術同儕展開更自由的對話，在彼此連結的同時，也使知識的運用得以轉化，進而回饋並益於社會。

強調公共取徑的專業者書寫

由電子郵件的通訊群組開始再轉到 Facebook 社團上保持聯繫，《芭樂人類學》糾集了九十餘名的人類學界研究者作寫手群，分工輪職提供文稿。在 2024 年以前，部落格以每週一至兩篇的頻率更新文章；2025 年起則調整為兩週一次。參與輪職的作者可自由選題，無需事先報備，甚至可以匿名投稿。提供的文章內容通常呈現最近在研究或教學上的心得，也有時事評論。因此，雖然社群成員平日可透過平台互動，但從《芭樂》的文章中，更能看見彼此的研究重點與思考方向。在專業隨筆與研究論文之間，《芭樂》的來稿文體自由。在不作引述額外文獻與在文末加註延伸閱讀書目的集體默契下，作者的文筆都盡可能地通順易讀並避免宏大敘事，常態的篇幅約在三千字左右。這些安排由三位編輯協助推動，除每季在作者群裡提供班表供自願認領並協調寫手使供稿穩定，也要為來稿提供校對和圖文排版的工作，以

及經營網路社群。編輯在處理來稿時，只會協助修改生硬語句、進行基本核實與校對，盡量讓學術工作者能以常民筆法書寫，而不進行稿件審查。某種意義上，《芭樂》可說是提供給人類學家自由書寫的一座舞台。

在《芭樂》書寫是自由的，但刊登文章者皆需取得博士學位。這項門檻源自發起成員的自我期許：推廣學術知識的責任應由學界工作者承擔，而非交由他人。歷來不乏累積了研究心得與田野材料、躍躍欲試的碩博士生表達加入意願，也常受到成員鼓勵在取得學位後再投入寫手行列。雖然《芭樂》的多數作者受過完整的人類學訓練，也有來自社會學、心理學等學門的研究者參與，他們多在與人類學相關的學術單位服務。正因成員具有類似的養成背景，刊登的文章往往呈現近似的思想脈絡——例如共同師承的學者、共用的人類學術語（jargon）、隱含的前理解、關注議題的視角，以及提問的旨趣（interests）。其核心皆強調以田野資料或經驗為論述基礎，並在議題討論中持續反省田野中「圈內人／圈外人」的權力關係。在同樣議題的討論上，和其他學科相比《芭樂》的文章更講究田野裡的細節，在詮釋的多樣性上更加開放，並對既有理論框架的應用保持謹慎；和非學院的文史工作者相較則更講究方法上要能自省，田野中要節制本有的思考慣性與刻板文化觀點。也因為寫手皆有學界背景，在寫作上不免延伸學院要求的知識紀律和引經據典的寫作習慣到《芭樂》上，偶有作者為求論理完整還提交萬字的長文（所謂的《硬芭樂》）。《芭樂》成員常需互相提醒為常民書寫的初衷，務求讓常民讀起來平易可親才好。

要學院裡的工作者節制學術寫作的習慣，改用常民可讀的筆法陳述知識並不容易，也是各學科在科普實作上始終面臨的難題，並非《芭樂》獨有。然而，相較於其他學門常見「將研究論文改寫成通俗文章」的做法，《芭樂》的園地有反向的安排，可謂特色：作者在《芭樂》發表隨筆性質的短文，原初往往出於對某個議題的好奇或初步觀察；但這些文章藉由讀者的回應與對話，逐漸協助作者釐清研究焦點與思路，並在資料同步累積的過程中，最終發展成可擴充改寫、在學術期刊發表的研究論文。簡言之，科普的短文不只是單向的由學術端啟動向外推介知識，還有藉開放對話激盪思路而展開學術研究的可能。這種現象某種程度反映了人類學在認識方法上的特質：研究者需本質性地節

制自身的先入之見，並對田野經驗的細節與觀點保持開放與彈性；透過文章建立的公共對話，也就成為推動研究進展的可能路徑之一。

另一方面，《芭樂》的作者群多為年輕一輩的人類學學者，在探索研究題材與觀點上更願意採取非例常的做法，在《芭樂》上的寫作有意與學術規格區別，因此作者們累積的成果能否嵌入建制化的學術活動中發表（比如作為年度研討會場次），在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內有過討論。儘管這些作品不必然能在年度學術會議上獲得正式報告的形式，但隨著寫手群的持續擴大，《芭樂》所引出的議題仍然在正式的學術活動中不斷發酵。而《芭樂》寫手在年度會議活動後的聚會交流——包括讀者作者見面會、議題回顧與展望等，是成員凝聚共識與情感交流的重要儀式。

此外，《芭樂》也經常推介人類學相關活動，例如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影片評介，或最新出版的人類學書籍之導論與書評。總體而言，僅管當年的《芭樂》青年成員如今也成為學會中堅，但這樣非體制、非正式、志願者社群的經營路線仍持續至今，與學會的關係持續維持距離，兩方互相理解但彼此為獨立運作。班表採開放式認領，僅少數空缺由編輯協調補上，也意味著《芭樂》的文章不一定能平均呈現學門各領域的最新動態。從長期的發展來看，在人類學四大支系中，在《芭樂》較為活躍的為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也有不少語言人類學學者貢獻所長。由於人類學的知識傳統原本就具備「公共人類學」的向度，特別關注公共議題、政策、國際情勢、社會機制或結構等，並以文化多樣性與相對性的角度提醒公共政策推行時的盲點。比如《芭樂》有許多文章談宗教類型紛雜或是多重性別屬性，或者提醒漢人中心思維導致對原住民文化的情境與脈絡細節的忽略等。透過這樣的書寫，《芭樂》的作者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社會認知，或產生公共效益，可視為承擔了公共責任，實踐了公共人類學的使命。而從文章主題的分佈也可窺見，《芭樂》優先追求與公眾對話、積極參與社會，而並非旨在全面而系統地向民間推廣學科知識。

同樣專業的讀者

《芭樂人類學》創立之初，核心成員曾透過網站後台與 Facebook 提供的統計數據，關注各篇文章的流量、讀者的地理與人口學分佈等資訊。這些讀者統計大致呈現：艱澀或偏重理論脈絡的文章流量較低，而貼近時事、以通俗筆法撰寫的文章則更能引發迴響，這也與《芭樂》以社會大眾為主要讀者的初衷相符。點閱數最高峰大約落在 2015 年左右，之後逐漸下降。然而，由於流量並非《芭樂》的追求目標，內部對此並未多作討論。但與實際讀者接觸的經驗，特別是來自寫手在課堂上接觸的學生回饋而言，可知《芭樂》在青年學子間的影響力仍很可觀，不乏人類學相關科系的大學生與研究生是《芭樂》的長期讀者，可說《芭樂》是促成青年投入人類學學習的推力之一。然而，相較其他學門，如社會學、政治學或歷史學往往能在國高中教育中扎根，並透過科普文章被納入中學參考讀物、教師培訓教材，甚至成為升學測驗的命題來源，人類學與中學課程之間的連結相對較不直覺。

另一方面，《芭樂》的文章持續在網站上收到讀者回應，進而擴散其能見度。留言者多半具有學術或研究相關背景，而作者的回應往往延伸至原文未及處理的面向；當留言往返熱烈、討論難以止息時，參與者也常再另撰文闡述自身觀點。比如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後，《芭樂》起先刊出人類學者的評論談電影再現原民抗日史的觀點歧義，在如何理解賽德克族的生命觀與部落儀式上，還捲動了法律學界、社會學界的學者撰文。也有邱韻芳老師關於「原住民專班」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各校原專班師生的許多討論。有時，這些熱烈的交流源於不同學科之間對知識理解方式的差異：密對同樣的社會現象或議題，人類學者對既有的解釋或概念（不論是常民常識或專家權威知識）常持戒慎保留的態度，重視呈現現場情境脈絡以及行動者自身的理解，這與其他學門提出的一般性解釋框架未必契合，在這樣的落差處常有精彩的交鋒。

相對而言，學術圈外的讀者留言較少，他們的論述通常簡略或難以聚焦；學生的留言則多具有功能性，例如請教升學問題或針對特定觀點提出疑問，較少在《芭樂》園地引起廣泛共鳴。然而《芭樂》仍有

心對非學術圈的讀者安排活動。兩次專書出版有新書推廣活動與讀者見面交流，更藉版稅收入舉辦「芭樂籽」的徵文比賽，希望鼓勵更多後進加入人類學研究與書寫的行列。

傳播平台變遷的新挑戰

寫作平台的技術變遷，也影響了《芭樂》的運作與能量。《芭樂》創始時風行的部落格寫作，和過去通過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相比，固然是自由與靈活的，也適合長篇文字與集合多人之力共筆的創作。然而，之後盛行的社群平台鼓勵個別使用者隨時提交短篇的圖文紀錄與心得隨筆，通過演算法集成並按使用者偏好推送內容，稀釋了原先部落格集體創作的能量和也分散了讀者的注意力。和過去相比，有的研究者更常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筆記與時事評論，也更積極地與讀者互動。比如《百工人類學》或《詮釋鬼打牆》都是人類學者透過個人帳號耕耘、逐步擴大連結而形成的新型網路社群。和自動執行的演算法安排的結果相比，《芭樂》寫手的邀集、文章的編輯與流通有手工的味道，但文字的份量紮實，作者讀者的連帶有機而緊密，與正式化的學術體制維持彈性關係，在人類學的本地科普工作上仍有代表性的位置。

然而，新的科技既推進了個人化的溝通形式，也衝擊了學術的神秘性與專家權威，使田野資料或圈內人行動的再詮釋更具挑戰性；同時，大眾讀者的閱讀習慣也呈現向非文字媒體平台移動的趨勢。為因應這一變化，除了在部落格持續筆耕外，《芭樂》近期推出了 Podcast 《芭樂人類學@左岸》，邀請人類學家用聊天帶出觀點與思想。一方面，這加強了《芭樂》成員之間的實體聯繫與交流；另一方面，也是在後文字時代貼近讀者的新嘗試。